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有所思

一场辩论阻止一桩暴行

□ 陈　良

公元前431年，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其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战争初期，雅典在伯里克利领导下，凭借强大的海军，采取陆地防御海上进攻的策略，而斯巴达则凭借强悍的步兵，在陆地上发动攻击，交战各有胜负，战局僵持不下。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爆发了瘟疫，雅典将士非战斗性减员惨重，伯里克利也不幸病逝。

进入战争的第四年，位于爱琴海东面莱斯沃斯岛上的米提利尼城邦背叛盟主雅典，准备与斯巴达结盟。在遭受瘟疫与战争双重磨难之际，盟友却在背后捅刀子，让雅典人难以容忍。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雅典尽管元气大伤，对付米提利尼还是绰绰有余。得知雅典派出舰队东征，米提利尼人赶紧寻求斯巴达援助，而斯巴达战舰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抵达提洛岛，从提洛岛又继续进发，其间耗费很多时间，等到临近莱斯沃斯岛，米提利尼人已经战败投降，雅典人带着战俘凯旋而归。

雅典民众欢庆胜利之后，接着就讨论如何处理战俘。为了泄愤解恨，情绪激动的雅典人通过一项决议，不仅要处死已经抓获的战俘，而且要将所有米提利尼成年男人都判死刑，所有妇女和未成年人都变成奴隶。随后，他们指派一艘三列桨战舰开往莱斯沃斯岛，向停留在米提利尼的雅典军队传达这个决议。

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绪平静下来，他们想到前一天的决议过于残酷，心里感觉忐忑不安。在雅典的米提利尼代表看到雅典人有所悔悟，于是与那些同情他们的雅典人一起去见政府当局，请求把这个问题提交公民大会再讨论一次。雅典当局顺应民意，同意立即召开公民大会，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进行讨论与表决。

在公民大会上，各方面人物纷纷表态发言，最终形成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对于昨天的决议，一种表示应维持不变，另一种表示要重新决定。前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叫克里昂，后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叫戴奥多都斯。

克里昂是伯里克利之后最有影响的政治领袖，前一天的议案就是在他的倡导下通过的，今天他依然固执己见，绝不让自己被打脸。克里昂在会上发言，明确表示自己没有改变主张，反复强调严惩米提利尼人很有必要。他认为，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就是马上报复。既然米提利尼人背叛了雅典，他们就是雅典的敌人，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美德只适用于对待朋友，而不宜于对待仇敌。米提利尼人背叛雅典，如果没有给予严厉报复，其他盟友也会随时背叛雅典，因为这样做，并没有可怕的后果。相反，要是让米提利尼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就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可以防止其他盟友的反叛。

等到克里昂发言完毕，戴奥多都斯站出来说话，前一天在会上他激烈地反对处死米提利尼人，此刻他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善良的公民不要只想威胁那些反对他的人，而应当用公正的论据做出决断。城邦和个人一样，都是天性易犯错误的。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止它，即使施用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犯罪。况且背叛雅典的米提利尼人主要是贵族，而人民并没有参加叛变，当他们得到武器的时候，马上自愿将城邦交给雅典。如果对他们格杀勿论，无疑是犯罪。以后有人发动叛变的话，将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我们不分青红皂白，让犯罪者与无辜者受到同样的处罚，反正是死路一条，只能迫使人家铤而走险。我们不能过于相信死刑的效力，不应当剥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们尽快赎罪的机会，不可轻易使他们陷于绝境。

戴奥多都斯指出，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不要被愤怒的情绪所左右，也不要被怜悯和宽容的心情所支配。发表自己看法后，戴奥多都斯提请大家采纳他的建议：将那些有涉嫌反叛的人送到雅典接受审判，其他人都不追究，让他们在自己的城邦自由生活。

很明显，两个代表人物的建议彼此对立，没有谁一个人说了算。何去何从，由公民自己决定。最后进行举手表决，双方的票数几乎旗鼓相当，戴奥多都斯的建议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与此同时，会议决定另派一艘三列桨战舰立即出发，向前方传达新的决议。

这艘三列桨战舰启航后，水手们拼命划桨，急速前进。第一艘战舰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出发了。他们非常担心，如果赶不上第一条战舰的话，米提利尼的居民就会被屠杀。所以，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平时水手在用餐时不划桨，晚间也停泊休息。这一回，第二艘战舰肩负着特殊使命，水手们轮流用餐休息，让战舰不停地航行。尽管如此，第一艘战舰还是先期抵达。所幸的是，当雅典指挥官接到命令，准备执行的时候，第二艘战舰已经驶入港口，恰好在紧要关头传令，及时阻止了即将进行的大屠杀，米提利尼人幸运逃脱劫难。

雅典人自动放弃原本议定的暴行，这个善举，可以说体现了雅典人的高尚。美国学者列奥·斯特劳斯在《政治哲学史》中，就以“雅典人的高尚”为题谈论过此事。当时雅典在希腊诸城邦当中文明程度最高，不仅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且文化发达。雅典人热爱自由，崇尚美德。他们视正义为最高的善，无论是对于城邦，还是对于个人，正义都是最高的德行。正义，既是判断善恶的原则，也是指导行为的准则。正是拥有正义感，使他们身上得以闪现出高尚的人性光辉，也正是基于正义感，使他们能够对背叛自己的米提利尼人选择了宽容与克制。当然，仅靠人性的高尚是不够的，最终让米提利尼人免遭灭顶之灾的却是雅典的政制。正是因为公民在大会上充分行使表达权与表决权，才能使理性战胜情绪，宽容克制复仇，从而阻止非人道的暴行。

米提利尼人是幸运的，幸运的是遇到文明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将雅典人宽恕米提利尼人的事迹写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称自己这部著作是“一切时代的财富”，的确不是狂言妄语。且不说全书蕴含丰富的内容，仅上述事件就能让人感受到文明的力量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史海拾零

唐代的大夫和将军

□ 徐　佳

白乐天《轻肥》有云：“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正如诗中所言，唐代大夫官印的印纽系着红色丝带，将军腰间的玉佩则拴着紫色的绳子，以此表明身份品级。其实这些所谓“大夫”“将军”，皆散官之名，亦称阶官，有官名而无职事，类似于“享受某某级待遇”。

唐代文武散官各九品29阶，文散官的前三品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特进正二品，光禄大夫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最末的九品散官则为：儒林郎正九品上，登仕郎正九品下，文林郎从九品上，将仕郎从九品下。武散官的前三品为：骠骑大将军从一品，辅国大将军正二品，镇军大将军从二品，冠军大将军正三品，云麾将军从三品。最末的九品散官则为：仁勇校尉正九品上，仁勇副尉正九品下，陪戎校尉从九品上，陪戎副尉从九品下。

乐天诗中“大夫”“将军”皆为高级散官，而此诗前一句是“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内臣即宦官，唐代宦官授散官，自肃宗而滥觞，因宦官李辅国拥立有功，加其为开府仪同三司，俨然一品大员。此后，宦官长期把持左、右神策军中尉之职，典掌禁军，借此废立天子，此辈皆服朱紫，享受散官名分待遇，侧目长安市，意气骄满路。

宋代名臣丁谓的经济头脑

□ 王兆贵

什么叫经济头脑，按常规解释，是以少的投入赚取多的收益，简单地说，就是让钱生钱。这样的解释并没错，但却没有说到点子上。在商言商，经济头脑是题中应有之义。好比说，科学家有了重大发现，你夸他有科学头脑，能算夸吗？倘若有位农民获得了多项国家技术专利，你夸他有科学头脑，那还值得一夸。所谓有经济头脑，应该是用最简便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看得准要害，拿得出办法，以最小的代价办成大的事业。

唐代崇贤人窦公，并非商贾，他在京城东郊买了块价格低廉的空地，地势低洼，积满了水，雇人填平它要花不少工钱。窦公灵机一动，就将这块洼地圈起来，在积水处立上标靶，并让女佣带着蒸饼来到洼地。然后对当地玩耍的孩子说，谁能用砖头瓦片击中洼地中任一标靶，就赏给他一个蒸饼。孩子们觉得既好玩，又可换到吃食，争相往洼地里投掷砖块瓦片。没多久，这块洼地就被填平了。在此基础上，窦公在上面盖起了客店，专留过往的波斯商人住宿，每天能获利一缗。这件事堪称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也算是有经济头脑，但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宋真宗时期宰相丁谓，经办了一项史上留名的艰巨工程，被沈括称之为“一举而三役济”，那才叫有经济头脑。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四月，丁谓奉命主管复建被烧毁的皇宫。丁谓乃一介文臣，并不精通土木工程。他到现场勘察，发现有三大难题不好解决。一是取土难，大量的土方要到远郊去取；二是运输难，大批的材料只能从外地漕运到汴水，再用车马运到工地；三是大堆的垃圾要运到城外处理。预算下来，不知要花费多少人力、财力和时间。

丁谓琢磨了一番，想出了一个省工省力又省钱的好办法。他先让工匠们在大街上挖土。没几天，大街就挖出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渠。然后让工匠将汴河水引进沟渠中，并用很多竹筏、木排和船只，将各种建材顺着沟渠运到宫门。宫殿竣工后，再将废墟清理出来的垃圾和废弃的建筑垃圾，回填到沟渠中，使街道平整复原。这一举措接连完成三件事，总计节省下来的经费以亿万计。

丁谓的经济头脑不是偶然表露出来的，而是贯穿他的一生。且不说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天象占卜、书画棋琴、诗词音律，无不通晓，是个多才多艺的通才，就拿下面这件小事来说，足以说明他的确有经济头脑。有一次，皇帝问他，唐朝的酒价是多少？丁谓脱口答道，每斗三百。皇帝问他怎么知道的，丁谓说有杜甫的诗句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这句诗出自杜甫的《逼仄行赠毕曜》，是有据可考的。在《杜臆》一书中，明代文学家王嗣奭引用北齐卢思道的话说：“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此诗酒价苦贵，乃实语。”你看，能从前人诗行中留心当年的酒价，还不算有经济头脑吗？

（上接1版）

对于执政党的治理问题，有的人总喜欢拿我们党的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来做文章，并由此产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质疑，产生对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的迷恋。实际上，这既缺乏对不同政党性质宗旨的深刻认知，也缺乏对政党解决自身问题的态度、措施和力度的比较研究及实际分析。纵观各个国家执政党的发展历史，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地正视自身问题、做到疾恶如仇，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纪律体系和制度体系，能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纪检监察体系，能够严肃惩处一大批包括像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这样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反观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先不说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被资本和金钱所控制的性质，仅就其自身的管理而言，大都缺乏严密的组织，缺少日常的活动，更谈不上严格的自我监督和约束，常常是为了应对大选、上台掌权而进行临时登记、临时动员，因此也常常被称之为“投票党”“选举党”。再看一看近期的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和民主党为争夺权力、搞垮对方不择手段，政党竞争变成了尔虞我诈，党派监督变成了相互攻讦，一场大选带来的是社会的撕裂，游行示威、对抗骚乱至今没有平息。由此可见，多党制、“三权分立”不是想象中的灵丹妙药，中国共产党建立形成的以自我革命精神为特质的管党治党模式，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当然，我们党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并不排斥而且还注重发挥外部力量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同黄炎培的“窑洞对”就作了鲜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针对我们党自身存在的毛病，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由延安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我们党建立“自律”和“他律”两种防错纠错机制的实践从未间断。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是加快了发展民主政治、加强民主监督方面的工作步伐。从建立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到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到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制度化发展等，这些都有力地拓宽了各种党外的民主监督渠道。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党对治理自身问题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不存在所谓的“以党内监督代替党外监督”的问题。

对于运用党外监督力量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做出相应的部署。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自觉按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要把党内监督同有关国家机关的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以形成监督的合力。这也再一次表明，在弘扬自我革命精神、从严管党治党问题上，我们党始终保持着对自身性质和权力来源的清醒认知，保持着对政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应有敬畏。作为一个在大国执政的大党，保持这样的认知和敬畏，不仅使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和优势的管党治党之路，也在带领当代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和优势的政治发展之路，更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答案。

（三）

我们党靠革命起家，毛泽东同志也曾把我们党比喻为“革命党”。可以说，革命精神已深深熔铸在党的基因和传统之中，也构成了党发展壮大的鲜明底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说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较之革命年代已经有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讲，革命者的风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不能丢。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也要求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在弘扬这一宝贵精神上做出不懈的努力。

第一，铸就保持初心的坚定意志。革命的动力来自革命的初心，有了对初心初衷的执着坚守，有了对理想信念的坚定追求，就有了正视自我、净化自我的意志和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各种诱惑陷阱不少，很容易忘记初心初衷、产生方向迷惑，很容易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需要经常问一问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使命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也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筑牢“压舱石”，拧紧“总开关”，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用信仰信念筑就自我革命的意志。

第二，涵养无私无畏的崇高境界。无私才能无畏，出以公心才能筑牢底气。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勇气从哪里来？说到底，是从党的性质和人民立场中来，是从无私无畏的革命情怀中来。只有时时处处摆正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的关系，坚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才能保持强大的人格力量，才能保持自我牺牲的崇高境界。因此，对于一名党员干部来说，必须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公仆本色，坚持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保持克己奉公、大公无私的情怀，始终做到甘于奉献、甘于付出。也只有摆脱了个人利益的束缚、摆脱了部门和地方利益的局限，才能以浩然正气、昂扬锐气涵养自我革命的勇气。

第三，强化正视问题的行动自觉。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高扬革命的精神，必须正视问题，强化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把“否定之否定”作为自我提升的遵循。实际上，问题总是客观存在，有问题也不可怕，怕就怕在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造成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演变为“大塌方”。因此，这里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常于自省内省，善于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先贤先辈和先进典型，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切实做到知耻而后勇。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实效更能检验一个党组织、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和作为。对于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对于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劲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第四，发挥以上率下的引领作用。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特殊的岗位和职责也决定了对管党治党的特殊作用。在弘扬自我革命精神上，必须抓好“关键少数”，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这也是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一条成功经验。一方面，要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从严要求自己，带头解决自身问题，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改正的自己首先改到位。另一方面，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主动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深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任务，不怕揭短亮丑，敢于纠错纠偏，严厉查处各种违纪违规现象，用一个个过硬的“小环境”构筑风清气正的“大生态”。唯有如此，才能在弘扬自我革命精神上形成强大合力，才能切实增强全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校长）